

陈平原 王德威 陈学超 编

西安： 都市想象 与文化记忆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 王德威 陈学超 编

西安： 都市想象 与文化记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14955-3

I. 西… II. ①陈…②王…③陈… III. 文化史-西安市-文集
IV. K29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0640 号

书 名: 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王德威 陈学超 编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955-3/G · 258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2.5 印张 376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陈平原 主编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 289 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

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序 言

陈平原

漫长的中国史上,曾做过都城的城市很多;但同为都城,持续时间及重要性相差甚远。其中至关重要的,按历史顺序,是西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北京(也有加上安阳而成“七大古都”的)。而“重中之重”,毫无疑问,前期是西安,后期是北京。这就很容易理解,我们之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为何首选这两座城市。

有那么两回,同是金秋时节,国内外同行相聚一堂,以历史文化为视角,为这两座伟大的城市“造像”、“招魂”。2003年10月,北大中文系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在北京召开“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年后,专题论文集问世。2006年11月,以“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包括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哥伦比亚大学的刘乐宁、陕西师范大学的陈学超以及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同样是两年后,相关的专题论文集也将推出。

专题论文集既不同于汗漫无涯的杂志,也不同于一以贯之的专著,讲究的是“众声喧哗”中,自有相近的学术视野与精神追求。本书收文20则,按论述对象略为区隔:第一辑乃“考古学及历史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二辑是

“古典文学视野中的长安”，第三辑为“近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西安”，第四辑专注于“当代西安的阅读与写作”，第五辑可称“古都西安的回顾与展望”。如此简要描述，只能是“大而言之”；以下关于各文的介绍，更必定挂一漏万。在我看来，好文章除了要有好立意，更需要条分缕析的详细论证。而对此类文章，任何“提要钩玄”的努力，都不可能得其神髓。作为编者之一，我的责任是“编目”与“撮要”，以便读者在最短时间内，初步了解此书的大致脉络。真正的专业评判，有赖各位深入细致的阅读。

研究古代城市，主要依靠考古学的发掘以及古代文献的解读；具体到周代城市，则尚须兼及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把这三类数据有效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周代城市的功能和特征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李峰《城市规制和古代国家的形态——以渭水中游周代城市为例》便是从此入手，认定西周时期的城市并没有形成像希腊—罗马文明中的那种城市自治体制，而是构成了一个由王室控制的城市网络。已有的用于分析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包括城市国家、邑制国家、领土国家、支系国家、封建国家以及所谓的乡村国家等；在这些模式中，作者认为，最能反映西周国家实况的，应该是根据中国古代资料所建立的“邑制国家”。

平势隆郎《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其理念基础》一文，主要讨论了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天方位的关系。秦始皇建造极庙，视之为天的中心，将天方位表现在地上。象征天方位的建筑有：始皇帝陵（生前称为骊山宫）、阿房宫、南山（其祭祀场所）、咸阳宫。咸阳宫在亥方位，骊山宫在卯方位，南山在午方位，阿房宫在申方位。长乐宫是唯一能用来讨论这种方位配列的极庙。

探讨中国古代的城市设计方式，以及中国人用何种形式将社会结构表现在城市规划上，西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城墙内的区域，特别适合。因为，不断出现的考古遗迹，让我们得以勾勒当初长安城的都市设计，以及主要街道的轮廓和宫殿群的蓝图。贝克定《西汉城市与城郊的结合——王莽九庙与西汉道路》在探讨时人对于空间的认知时，用首都城墙周围的郊区或远鄙地区的空间规划来观察，而不采用都市居民对于自家房间与庭院的配置。其基本假定是，在开阔而不受限制的空间，更能自由地发挥时人对于空间的

经营概念；而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是受既有的社会规范所影响的，而非只是个人的想法。

唐长安的宏观规划——包括里坊、市场、宫殿、官邸、寺院、街道等诸方面，均得到学者的关注；而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却鲜有人问津，主要原因是资料匮乏，迄今的考古发现尚难以提供直接的研究证据。熊存瑞《唐长安住房略》以宋敏求、徐松收集的资料为主，结合政令、正史、杂史、笔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探讨唐长安民居的若干问题，如竞奢之风、房产价值、火灾、房产税等，使我们对这座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世纪城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假如研究“历史记忆”，宋以后的长安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帝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但在宋以后，逐渐从中心退居边缘。于是，长安的历史，既可以被写成一部国都史，也可以被写成一部地方史；而地方志的作者，往往得进行这样的取舍。王昌伟《从“遗迹”到“文献”——宋明时期的陕西方志》以从宋代到明代的陕西方志为考察对象，探讨陕西作为一个集体记忆的载体被建构的历史，并从编纂者的书写原则及所引起的讨论，一窥士人社群对帝国与地方的关系的思考。明代陕西方志在体例和内容上，都和宋元时期的同类作品大不相同。最明显的，就是明代方志的编纂者对于历代都城遗迹的重视，远不如宋元时代的编纂者；而其新增“文献”、“人物”等类目，把重点从对古迹的记载转向对地方人文传统的记录。可以这么说，明代学者重视的是如何以方志延续人文传统，改善社会风气，以达到教化的目的。

作为汉唐盛世的象征，“长安”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新莽乱后，东汉迁都洛阳，尽管长安仍是《两都》、《二京》等京都大赋的书写重心，却是作为洛阳的“对立面”存在：原先宏伟的宫殿范围、壮盛的游观赏猎，在赋家推尊洛阳之崇尚仁德礼仪时，成为被批判检讨的负面教材。梅家玲《从长安到洛阳——汉赋中的京都论述及其转化》循由京都大赋的地理转移历程，探讨其发展迁变的轨迹。剥落了帝国润饰鸿业的表层华藻，“京都论述”所建树的结构方式，并未随帝国盛世的远去而消逝，反而经由“空间书写”到“地方书写”的渐次转化，以另类形式融入了个人抒情言

志的文本中。如此一来,长安也好,洛阳也罢,其意义便不再是作为帝国的资产、盛世的象征,而是庶民家族安身立命的家园,更是个体生命可见可闻且自我实践的栖居之地。

唐朝存在于印刷时代之前,因而,诗歌的生产与传播,必然受到地点和时间两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长安是怎样地随着诗的节奏震荡着。从皇宫到妓馆,诗溢满了长安城,并且从长安流向外省。倪健《唐代长安诗歌的流传》考察诗歌在长安流传的情况,以及诗的流传对于都城所起的作用(包括商业方面)。作者力图说明,稠密的人口和较高的教育水平,使长安成为诗歌迅速地口头流传的理想地点。而各级官员、赴京考试的学子以及北里歌妓,则是唐长安诗歌流传的中心。

中国诗歌的主体性从本质上是关于见与被见的问题。唐代的李白和王维,虽然风格很不一样,可是有相似之处:都依赖于外在主体的视觉洞察,以刻画诗歌中的主体性。方葆珍《“知人”于唐朝——中国诗歌主体的形成》所要论述的是,王维将读者引诱进他所创造的视觉框架,以便诗内和诗外的主体合二为一;李白常会特意作出拒绝外在主体的仪态,如“独酌无相亲”,一面声明其身体和感情的孤立,一面将所有目光集中于自己身上。

《冥报记》所记事项之前后因果报应,几乎纯属胡思乱想;但书中所述故事发生的场所等,却可藉以复原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历史面貌。辛德勇《〈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称,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在当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国际大都市。最早系统记述这座城市的传世典籍,乃唐玄宗开元年间史官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然亦仅有残本存留于日本。《冥报记》涉及的隋唐西京城,虽零星不成系统,但都是高宗永徽年间以前的情况,足以证实或补充《两京新记》等晚出著述的记载;并且,这种不经意的记述,有时反而更准确地保存下一些重要的史事,起到专门著述无法替代的作用。

隋代“开皇乐议”以音乐理论为论辩主体,但牵涉面甚广,不妨视为“中古长安”的一场“音乐风云”。沈冬《中古长安,音乐风云——隋代“开皇乐议”与音乐、文化变迁》不但强调此事件在音乐内部与外部两方面的高度重要性,同时也试图证明其关键意义是,总结了过去的发展且带动了未来的演

进。所谓的“风云”至少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看：其一，由此事的文化背景看，是雅乐、俗乐、胡乐三者数百年来濡染交化所引起的大融合；其二，由此事音乐论辩看，是众臣各执立场、交锋不断的大争议；其三，由此事政治影响看，是由音乐论辩而至政治斗争，终于导致权臣黜落的大震撼。由此可见，“开皇乐议”虽着眼于音乐，其带动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

宋元以降，中国叙事文学飞越发展，白话小说横跨雅俗，在出版市场上亦占有一席之地。然而，此时小说的重心却早已随着经济与文化发展的趋势，远离关中地区，完全向东南位移了。虽仍有不少小说作品牵涉到长安，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对汉、隋、唐时期都城长安的投射，而与小说产生当代的长安没有关系。胡晓真《夜行长安——明清叙事文学中的长安城》所要论述的是，在明清叙事文学中，长安只能夜行——这是一个在文本中被高度历史化，以至于无法表现实体存在的场所。隐喻与象征，因此便成为小说对长安城的基本处理模式。

谈论近现代文化史视野中的西安，不能不关注易俗社。李孝悌《西安易俗社与中国近代的戏曲改良运动》对比西安易俗社和上海新舞台的演出，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二者皆关心当代议题，皆以戏剧为教育、娱乐大众的媒介，皆与20世纪初至1930年代成型的论述相符。但此二剧社在方针、功能及社员组成上，却有极大的差异。在新舞台演出的改革剧中，我们看到传统的主题、传说、信仰、历史事件和角色，如何被巧妙地与现代议题、当代关怀和新想法交织在一起。易俗社的表演所呈现的，则不只是新与旧的融合，更是传统的坚韧。虽然易俗社和新舞台都以致力改革戏剧著称，然而两者地理、经济及历史上的差异，使其有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1924年的7、8月间，应西北大学的邀请，鲁迅前往西安讲学。鲁迅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创作长篇小说或剧本《杨贵妃》作准备；没想到旅行结束时，计划取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鲁迅放弃此写作计划，以至于留下了无可弥补的遗憾，害得后人为鲁迅能否写长篇小说而争论不休？后世的众说纷纭，大都将《杨贵妃》的“不幸流产”，归咎于西安的自然环境、政治氛围以及社会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但又都不足以充分说明问

题。陈平原《长安的失落与重建——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除了努力钩稽、复原鲁迅的“杨贵妃”小说或戏剧创作计划，更着重阐述：作为思接千古、神游万仞的小说家，到底该如何复活那已经永远消逝了的“唐朝的天空”，以及如何借纸上风云，重建千年古都长安。论文经由对这一“故事”的深入剖析，呈现城市记忆、作家才识以及学术潮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探讨古都的外在景观与作家的心灵体验之间的巨大张力，思考在文本世界“重建古都”的可能性及必经途径。

五四时代蔚为奇观的“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争，最具代表性的，是从徽州走出的胡适和从长安走出的吴宓。陈学超《大梦谁先醒——从长安走出的吴宓》对吴宓融合中西、撷精取粹的态度大为赞赏，认为其在波诡云谲的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作为稳健的革新者的足迹，其中渗透的文化精神，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体会、吸取。

辨析林语堂长篇小说《朱门》中的“西安想象”，是宋伟杰《古都，朱门，纷繁的困惑——林语堂〈朱门〉的西安想象》一文的中心任务。小说男主人公李飞是一个生于西安、长于西安，在上海历练之后，重返故乡的现代人。李飞之眼是记者之眼，但他不是普通的职业记者，因为“他向来不喜欢把任何事情写得记录化、统计化，而是在字里行间表达他个人的感触”。李飞是西安古城一个性情流露的观察者，一个保持距离的目击者，一个入得其内、出得其外的写生画家，一个诙谐幽默、嬉笑怒骂的作者，一个在故乡现场追踪、敏锐思考的漫步者。其眼中的西安，因此成了对古城的现代打量。

王德威《废都里的秦腔——贾平凹的小说》所要讨论的是，贾平凹如何将秦腔作为定义民间生活伦理的最后支柱。秦腔的架势气吞山河，可是调门一转，飞扬的尘土、汹涌的吼叫都还是要落实在穿衣吃饭上。作者认为，从《废都》到《秦腔》，贾平凹对中国城乡的蜕变有动人的观察，但是，只有当他将自身的“黏液质+抑郁质”扩散成为文明乃至天地的共相，黏黏糊糊，才形成了自己的“场”。有意无意间，他的小说投射了社会知识阶层的一种精神面貌。谓之虚无、谓之自怜，都有道理。然而物伤其类，作为贾平凹的读者，我们能不心有戚戚焉？吊诡的是，颓废的文明成就了一个作家的文名。

葛岩《1970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论

文,更像是关于特殊年代西安的“读书记忆”。除了思想的追求,青春期反叛的心理和生理冲动、社会群体身份的认同、现实利益的吸引等,都可能成为地下读书的驱动力。而对“文革”时期地下读书活动的动机、条件和约束的不断追问,或可指向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在严峻体制的控制下,为什么异端知识依然可能传播?本源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革命情怀和破坏力,可追溯到俄国民粹主义者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献身理想的传奇,成为这些读者反叛想象的重要来源。而“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则使一些人顽强地把个人成长的激情紧紧与现实政治连接,以至成为“文革”政治的对抗者。为维护体制而出版的书籍,竟成了他们质疑体制的思想根据。

历史上,长安的文学是那样辉煌,不仅太史公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赋和唐诗堪称文学史上空前的美文华章,即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都令人赞美不绝。但到了“废都时代”,西安的文学,竟也像古城一样开始废弛颓败。李继凯、李春燕《西安小说作家近期创作心态管窥》认为,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大抵仍是荒凉一片,偶有小花野草轻摇,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作家方才八仙过海,大显身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陕军”中的主力。

与以上各文之倾向于“精雕细刻”不同,第五辑所收二文纵论古今时,取“大题小做”策略。朱士光《古都西安的发展变迁及其与历史文化嬗变之关系》综述西安三千余年的城市发展史,从西周丰镐都城建筑,到秦始皇营建“弥山跨谷”的庞大帝都咸阳,继之以汉唐帝国都城长安的横空出世;唐之后至清末一千年间,长安虽不再为国都,却仍是中国西北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而最近一百年,虽历经战祸与动乱,西安艰难地转型,现正朝着现代化国际都市的目标迈进。相对于朱的历史描述,肖云儒《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更像是文人抒怀:西安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虽不能止于“发思古之幽情”,却应该“发思古之优势”,以现代的、独有的思路和方法,使古城的古调翻成新曲,而不是轻率地、轻易地、轻浮地抛却古调,另谱新声。作者认为,中国的印章西安,正用自己的发展,印证着中华民族的振兴。

除了本书所收 20 篇文章,在“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

上,美国匹茨堡大学荣休讲座教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发表了专题演讲,至于提交论文而未入集的有:日本东京大学户仓英美教授的《长安美女骑帚翔——从汉唐小说看西方文化流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刘乐宁教授的《西安城市文化的语言学视角》、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教授的《西安气候:唐人笔下的纪录和追思》、西北大学李浩教授的《唐长安园林与西安文化建设》、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的《西安大遗址保护与汉唐文化的彰显》等。以上论文,因各种缘故未能提交定稿,实为憾事。不过,各位教授对会议的鼎力支持,仍令人心存感激。

此外,会议期间,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插曲:邀请部分学者参加“把历史还原给文学——贾平凹《秦腔》获奖对话会”,这在意料之中;组织全体与会专家,与市委及市政府诸多官员就“西安城市文化建设方略”展开真诚对话,可就有点出乎意外了。“史学研究”与“建言献策”不在一个层面,但能让当局了解学者们的立场与趣味,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看《西安晚报》长篇文章报道所使用的小标题:诸如“珍惜每一座古塔、每一个牌坊、每一间民房”、“留住民间的生活印迹”、“西安是西安人的西安”、“保存城市记忆要发动民间力量”、“现代西安应汲取汉唐精神”、“汉唐的厚重宏大值得称道”、“文化传承从育人做起”、“建立西安全方位文化标志体系”、“请马友友做新的西安形象代言人”等,确实显示了专家们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参见《学者献策古城文化建设/孙清云等参加研讨》,2006年11月4日《西安晚报》)。至于是否真有效果,那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了。

正如《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的“总序”所说,我们希望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就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展开深入的探讨。至于下一轮的“话题”将是哪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取决于天时、地利与人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关于“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发掘与辨析,将是一项充满魅力与挑战的“长期计划”。

2008年9月2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目 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1

序 言/陈平原/1

城市规制和古代国家的形态

——以渭水中游周代城市为例/李 峰/1

秦始皇的城市建设计划与其理念基础/平势隆郎/21

西汉城市与城郊的结合

——王莽九庙与西汉道路/贝克定/39

唐长安住房考略/熊存瑞/56

从“遗迹”到“文献”

——宋明时期的陕西方志/王昌伟/74

从长安到洛阳

——汉赋中的京都论述及其转化/梅家玲/89

唐代长安诗歌的流传/倪 健/104

“知人”于唐朝

——中国诗歌主体的形成/方葆珍/116

《冥报记》报应故事中的隋唐西京影像/辛德勇/129

中古长安,音乐风云

——隋代“开皇乐议”与音乐、文化变迁/沈 冬/152

夜行长安

——明清叙事文学中的长安城/胡晓真/182

西安易俗社与中国近代的戏曲改良运动/李孝悌/195

长安的失落与重建

——以鲁迅的旅行及写作为中心/陈平原/212

大梦谁先醒

——从长安走出的吴宓/陈学超/259

古都,朱门,纷繁的困惑

——林语堂《朱门》的西安想象/宋伟杰/266

废都里的秦腔

——贾平凹的小说/王德威/278

1970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葛 岩/293

西安小说作家近期创作心态管窥/李继凯、李春燕/310

古都西安的发展变迁及其与历史文化嬗变之关系/朱士光/322

汉唐记忆与西安文化/肖云儒/338

城市规制和古代国家的形态

——以渭水中游周代城市为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李峰

一、城市和国家

人类的城市,从最早的耶利哥(Jericho)到乌鲁克(Uruk)、乌尔(Ur)这样的早期国家的大城,从罗马、长安这样的古代帝国中心到纽约、上海这样的现代文明之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影响一个特定时空的古代城市的因素包括文化、经济、军事、宗教和政治等众多方面,因此对古代城市的解释也可以从这诸多方面来进行。从文化方面讲,譬如说中国古代城市多采用一种棋盘式的坐北朝南的布局,而不同于罗马、雅典等地中海国家城市的中心放射性布局。这与古代中国的宇宙观有联系,需要从文化的传统上结合文化系统中的诸多其他因素来考虑。经济方面,比如